

她微笑着,对我切切絮语

□徐然

部都千载难逢的幸运。

“八年抗战我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不止一次,母亲怀着既遗憾又难过的神情对我说。

《青春之歌》的出版尽管也有坎坷,但她在1958年问世,时间是恰当的。在她之前,一些描写知识分子加爱情加革命的小说大都受到了批判;在此之后,不久就是十年的浩劫。《青春之歌》出版后,《北京日报》的田藏申女士独具慧眼,在日报上给予连载,扩大了作品影响。接着由崔嵬导演并配以国内一流摄影、优秀演员的电影《青春之歌》拍摄成功,更使《青春之歌》家喻户晓。再后,作品引起争议,讨论,又有矛盾做出结论性的评价。这是《青春之歌》毋庸置疑的机遇。

母亲的右眉上部有一颗黑痣,我的奶奶是个崇尚多神的迷信老太太。她不懂《青春之歌》是什么,但对于儿媳妇当八路大难不死,却深有感慨,她常念叨:“你妈那眉毛上是什么?那是喜鹊登梅!你妈是福将!”

然耶非耶,听了总是让人高兴。

二

人,往往对近在眼前的东西越不仔细看,越难看得清。我是编辑,业余又舞弄点文墨,使我对她的作品的艺术功力有些不服气。我似乎说:“《青春之歌》就是那么回事儿……”“土八路的作品,就靠那么点打日本的生活,表达一个既定的概念而已。”

改变我的狂妄自大是在两年前。不记得是哪一篇文章,我写到母亲怀抱婴儿的我逃出上海,在南京遭轰炸,她把我放在肚子底下,我使劲哭的情景。我好好琢磨了一阵子。那场景,母亲叙述得有声有色,我写出来却怎么也不生动,无论怎样权衡辞藻,还是干巴巴的。不久我拿到《杨沫文集》的散文卷,三翻两翻翻到一篇文章,那儿,母亲正写着那让我犯难的同一情节——“我一人紧抱着孩子,趴在潮湿的、杂草丛生的野地里,这时,我既不看星星,更不看月亮,我全部心思都放在我孩子身上——只要她不被炸死,我就心满意足。”既简单又明白,却使一个母亲的形象跃然纸上。读着读着,我入迷了,心却有点不是滋味,有点迷惘不解。思索了好久,我服气了。朴实厚重是母亲的文学风格;文学表达能给人以憨实朴

重而不是华丽轻飘,本身就是高明的文学技巧,正是“大智若愚”的道理吧?

我相信“文如其人”,尽管文与人的连带形式常常极为复杂,但一般总有其可循的规律。母亲正是一个憨实朴重之人。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的成功依靠的是写来写去,熟能生巧。妈妈到70岁还在写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快80岁还在自己动手整理、增改《杨沫文集》,还在应邀为出版社改适合儿童阅读的节本《青春之歌》等等。晚年的母亲,生活能力和活动范围受到许多限制,她老了,笨了,但在文学上却始终保持着敏慧的头脑。

不令母亲遗憾的是,七卷本,280余万字的《杨沫文集》,抢在她逝世一年前峻版。书十分精美,每一封面都是妈妈不同年代笑意盈盈的照片。遗憾的是,这些年许多名著都曾搬上银幕,“三歌”也曾有不少影视部门问津,但母亲却始终未能目睹她的作品搬上电视屏幕。

三

《杨沫文集》第七卷,作为附录登载了母亲写给我的约10万字的书信。因为母亲老迈多病,付梓前我作了一遍校改。实话说,从前拆读这些信,此时整理这些信,我都有点儿忐忑——怕挨骂。妈妈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我在文章中称她为“正统妈妈”。包括我女孩子时代的情感生活,妈妈干预的言词竟是:“像这样雷锋式的人物,你为什么不爱?”

文化大革命对她毕竟有所撼动,她才认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你要进步快点”、“要做一个好的革命后代”一类的话语,才不再经常出现在她的信中。她真是真切地信奉她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人的事业,一点点也不是作假,没有信仰上的个人功利。我相信。

20世纪80年代,在我寂寞的文学路途上,有作品获了几种奖拍了电影。面临全国文学作品评奖时,一个文坛前辈告诫我:“还是要活动一下,最好杨沫能打个招呼。”我没有找人,也没有向母亲,我知道她不会帮这种忙,哪怕是为她自己也不会。作品落选了,落选的日子心里挺失落的。

1994年,母亲与我合著的共写女性的集子《青蓝园》出版,有谁知道,这本书差点出不来呢?根结是因为其中我的一篇中篇《韶华杨家

三姐妹》。还是八九年前,我曾采访母亲,听她叙述她自己以及我的外祖父母及二位姨妈的往事。除笔记外还有6盘录音。我自然用我的见解和手法行文,对于“性”,因为牵涉到母亲和白杨,实在是小心又小心。完稿后的1993年秋,我挺自信地把稿子送给母亲过目。忽然有一天,母亲来了一封信,厚厚的一个大信封,沉甸甸的!那封信我没有胆量再看第二回的。是因为我写了她的初夜,写了外祖父母的浪漫结合。

“这么写不行,我给你说的你就都能写吗?”她说。

我也犟,决定不理妈妈,不出这本书,还通知了出版社。许多天不去看望正在海军总医院住院的妈妈。还是她心软了,打电话告诉我,改一改用……善良多情的妈妈又回来了。我也妥协,但是改起来毫无激情,删去前面的细节,后来却又延续,剩下干巴巴的骨头。——连名字也改了。原名是《青春杨家三姐妹》,妈不让用“青春”二字……

可以想见,对于人家写《杨沫的初恋》、《梅开二度访杨沫》一类,正统的母亲是何等的反感。两场纠葛,尤其是后者,伤了妈妈的元气。

妈妈一向豁达宽容。她喜好读书,从不拒绝新鲜事物,一双美丽的眼睛总是渴求地注视着世界。直到晚年,我与她谈话,无论是抽象的抑或是具体的,她都善解人意。却不知为什么,一关乎她的私生活,别人想弄几笔,母亲就非常警觉,毫不宽容。

当然,她是个信仰纯正的革命者。

四

母亲离世后,一些报章登载纪念文章,谈及她的死因,说法不一。虽然母亲已年逾古稀,但弄不清楚她的死因,于我说就有母亲死的不明不白之痛。1995年8月,查出她胸部有积液,在积液中找到癌细胞。母亲尚无自觉症状,依然红润,健康,精神。那时有从医的朋友告知:“老年人新陈代谢慢,相对癌细胞发展也慢,她身上的癌细胞可能早就有了,到危生命总有一段时间,多加强点免疫力,就更有希望……”

我始终相信这分析有道理。

在选择进行放疗的医院时,母亲因为得知

叶君健在北大医院治好了癌症,而对这家医院情有独钟。我则兴奋地在一旁帮腔:“妈,我相信我的直觉,就这儿好!在市中心,我们看方便。”那时,妈妈眨动着眼睛含笑望我,轻信的她怎会不相信女儿的直觉?

中国人善礼仪,知道谁得了不治之症,再忙也要见上一面的。北大医院在北京市中心,我去看望妈妈方便,别人也方便。这样,母亲一面做放疗治疗,一面要不断会见前来探视的亲朋好友,病房里你来我往,有时五六人同挤小屋探望妈妈,这其中包括我一家。

秋末冬初,大城市流感极其猖獗……

母亲一直充满自信地配合着医院进行治疗,后来的一波三折不是她所料,也不是我们所料。

不包括使用维持生命的机械而延续的那几个小时,母亲告别人世的实际情况是1995年12月10日(周日)上午11时35分。那一个上午,母亲曾多次用眼睛示意,用嘴巴蠕动表达某个要求。我猜了几次,大声问着她,她都急切地摇头表示不是,就那么带着遗憾匆匆而去了。

因此我有着久久的懊悔和自责。

临终前,她十分难受,让我叫大夫?

是让我去叫她感情深笃的晚年伴侣——我的李叔叔?

是让我拿纸笔,她说不出却可以写?

妈妈,对不起!

妈妈走后,梦中见过她的。我与妈妈看展览,到达一个大厅,她说:我鞋不合适,脚难受,你回家给我找一双合适的鞋来。我奔走在都市的楼宇间,总不能找到母亲的住所,又去百货店,店里一副收摊停业的混乱状况,没有鞋可买。梦醒的那天上午10时,在母亲的寓所操办后事的弟弟打来电话说,妈妈的脚肿着,你给她再买双大点号的鞋……

还是这一天的正午,小睡一刻,恍惚中想,明天下午的活动,约妈妈一起去。立刻凄然而悟——明天下午是妈妈的告别式啊……

母亲生前打电话给我总是一式的开场:“徐然吗,我是妈妈!”不管我对她的声调多么熟悉,妈妈总是认认真真地自报:我是妈妈。

听!电话丁零,我依在期待……

栩栩如生的妈妈无处不在,总感觉她微笑着,对我切切絮语。

母亲的身份有两种:老革命兼作家。这就使她不得不在战争年代把孩子交给农村的公婆抚养。我和两个弟弟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了童年。直到1944年春季,母亲才接到她战斗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还是儿童的我,虽然对母亲的战斗岁月记忆不清,她所遭遇的一次大惊险却至今不忘。一个冬夜,母亲只对我说有情况,没有多加解释,就留我在老乡家,独自匆匆而去。不记得过了多久,妈妈终于回来了,告诉我:“好险哪!”

原来她是渡过封冻的拒马河,躲避日本人的扫荡。那天夜里,母亲爬上黑黢黢的拒马河堤,看看四下无人,就冲下大堤,踏冰去对岸那隐约可见的村庄。进村时,母亲经过村口的一座瓦房院,看见临街两扇厚重的大黑门敞开着,阒无人迹,就沿路直往村里走。凌晨的村落,清冷沉寂。母亲正欲寻找可藏身的“堡垒户”,忽然与一人迎面而遇,那人向母亲盯视片刻,似乎看出了母亲的身份,悄悄惊呼:“老天爷,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瞄了一下周围,不远处有个柴垛,就推拉着母亲钻进了柴草垛,这才说,“村里有日本人,我不来你可不能动!”

母亲所遇到的是一位进步的村干部,几个小时后,他得机会才把冻得瑟瑟发抖的母亲带到一个老乡家。那家人给母亲换上当地妇女的衣装,刚安顿好,就被敌人赶到场院上集中。母亲站在妇女队里,她看见,场院上几个身着八路军军服的战士被日本鬼子捆绑着……

她就这样闯过了日本人的屠刀。

使我对妈妈此次历险不忘的还不是以上情景,而是后来她和那位救她的村干部的一番对话:

“你从哪儿来?”

“从河北边儿。”

“日本人占这村儿好几天了,河堤上一直放了哨呀!”

“……”

“你进村过一个大黑门没有?”

“过了。”

“那是鬼子的司令部,大门口有哨兵呀!”

就是这么巧,母亲上堤,进村,恰遇村干部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道路选择

百年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度和文化选择。文化重建和制度重构,是五四知识分子主动承担的历史使命。杨沫读书的年代,五四新思想和新文学方兴未艾,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给了杨沫最初的文学启蒙和思想启蒙。作为早期共产党员,入党前数年,杨沫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入党后,更是信仰坚定。可以说,在丁玲、沈从文、周扬、杨沫等作家身上,完全可以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和命运走向。知识分子之于现代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青春之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转换、信仰转换和心灵转换的经典文本。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杨沫以巨大的革命热情覆盖了个人情感,以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为主线,隐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生命历程,并进而隐喻国家和民族必然的道路选择。知识分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与被改造,这个话题看起来也是老生常谈了。林道静身上的革命冲动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以往我们强调阶级论、血统论,强调五四个解放追求自由的思想影响,那么,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文化特质看,人道主义是主导,即所谓小布尔乔亚,正因有为这种小布尔乔亚特性,所以要融入革命大家庭,就不仅要经历信仰磨砺和情感考验,还要经受肉体的残酷折磨,由此形成新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被动形成和主动消解,从中不难看出近现代中国革命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路径。《青春之歌》中,并没有从五四知识分子怀抱改造社会拯救中国的自信写起,而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投无路,作为革命思想形成的起点,也没有写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建立后不断接受规训和自我改造的历程,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知识分子命运和道路的断代史,在这个横截面中,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改造,是女性献身革命的生命仪式,这种类宗教意义,在半个多世纪的当代史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林道静和江玫一样,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原本对生活充满浪漫想象,

杨沫的革命叙事与我们的历史反思

□张艳梅

可惜时世艰难容不下她们的小资情调,最终两个人都选择放弃个人主义,走上革命道路。这一主体性异化为革命性的过程,实际上是清洗知识分子原罪的过程。当然,林道静和江玫并不完全相似。林道静有着更多革命动机,父亲血统为官僚地主阶级,母亲血统为农民阶级。这一出身的双重性是知识分子政治身份模糊,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的伏笔;当然,也是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改造和坚持毫不留情的自我改造的根源。林道静出走路上有很多考验,甚至以死来反抗命运,绝境中,对人生的思索要来得更凛冽。在爱情和革命的选择面前,林道静倒并没有多少犹豫和痛苦,卢嘉川这个形象比较接近理想主义,这个大英雄的出现,甚至比光芒万丈的革命思想更吸引林道静,所以对于林道静而言,并不是牺牲爱情皈依革命,而是爱情和革命完全一体化成为她献身的目标,这一点从她写给卢嘉川的信中看得很清楚。江玫其实一直在爱情和革命的天平上摇摆的,虽然她同情革命,也有萧索的不断感召引领,但她还是后来得知父亲之死真相,才坚定了革命信念的,阶级身份并不是她革命动机的前提。当然,我们回头看,丁玲在《韦护》时代的几篇小说中,对于革命与爱情有着更复杂幽婉的表达。丽嘉、美琳和玛丽无论选择革命,还是因为不革命被抛弃,都具有两面性,选择革命的美琳身上有着盲目性,丽嘉和玛丽却从不批判精神,这当然也可以用来剖析丁玲的双重人格。比较而言,杨沫的写作姿态就相对简单得多,大历史已经确定轨道,个人所有异样的时代感都被收紧,外在环境的改造力量,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起始重塑三观,终结于队伍纯化。

革命与爱欲的彼此投射

革命加恋爱不是杨沫发明的,也不是宗璞对这

一点的处理方式很有意思。余永泽和齐虹这两个形象都是作为革命的对立面来塑造的。这两位西方人文主义者,都是名牌大学的优等生,虽然专业不同,但都爱好文学艺术,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作为不革命的典型,余永泽躲进小楼成一统,齐虹去国离乡远渡重洋。余永泽其实是更标准的五四知识分子,身上有着浪漫主义诗情画意,思想里包含着自由主义政治观。继承的是胡适的思想理路,当然也不乏鲁迅式的对民众的不信任,以及对群众斗争的反感。鲁迅早期同样是个个人主义至上,并且始终对于庸众不信任,余永泽的洁身自好,安分守己读书向学本身并无过错,在大时代里,因为没有跟上历史的洪流,就成了反面典型。齐虹同样很优秀,热爱音乐,艺术感强,和江玫有很多共同语言,并且同样有着本能的人道主义情感,这位银行家少爷并不恐惧和憎恶底层社会,相反,某种意义上他对于社会黑暗有着甚至比江玫更清楚的认识,只不过他崇尚自由主义,个体关怀胜过了社会关怀。其实在丁玲笔下,也有着同样的男性形象。《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的子彬就是余永泽、齐虹这个群像的先驱,至于小说中若泉扮演的则是卢嘉川的角色。这些人在大时代浪潮中没有选择进步,而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走上了逃避革命之路。多年以后,当杨沫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出卖她的,恰好是她的丈夫和战友;保护她的,是被她抛弃的恋人和反革命。这个历史的症结,大约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吗。

林道静作为大家庭的叛逃者、进步思想的宣讲者、小家庭的否定者、大革命的追随者,不能说没有自己对于人生和世界的判断力,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显然比江玫时来得惨烈,她的革命冲动里,不乏铁板一块,革命冲劲里,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和性别两个方向,一方面革命男性更倾向于禁欲,以崇高的革命理想排斥个人情爱和欲望;

另一方面,女性的革命精神又往往体现在对个体欲望的自由表达,甚至过度张扬。个人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就是一条虚幻之路,革命叙事中,女性往往作为革命的对象,或者作为革命的镜像,总之,不存在独立的自我价值。在宏大的历史关怀之中,爱欲就这样不断被革命化、被政治化、被历史化。

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

作为一部小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青春之歌》在表达革命青年的感情世界裂变和政治意识形成等方面,都具有超越时代的史料价值。在革命话语和情爱叙事之间,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追问的。既是关于共和国道路选择的寓言,女性成长更像是毁誉参半的革命镜像。林道静是早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的重叠,她的思想转换里,有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潜在话语。其实抛开这一局限,我们去看现代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断裂,就会发觉,这不仅仅是五四思想解放与左翼革命的断裂,也是现代与传统的双向对照。余永泽和齐虹在小说中清誉尽毁,算是写作者对于自己曾经的民主背影一种完全彻底的告别。林道静的转变,不仅仅是向她那不清白的出身告别,还是向她的读书时代告别。出身悲剧与苦难意识,被转换为革命基因和政治诉求,林道静的成长因此更合乎革命逻辑。余永泽的胡适主义思想背景,被杨沫钉上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耻辱柱,林道静与余永泽决然分手,算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转向的前奏。血统论,一向是革命文学的起点之一,革命理论中不乏反智主义倾向,对于知识分子的抵触和批判,不是孤立事件。